



# 琅琊山下龙吟马啸的历史

## ——《南京太仆寺志》出版导读

张祥林

滁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,与古都南京倚江相望,城西风景秀丽的琅琊山因为欧阳修与醉翁亭而名扬遐迩。近些年在丰乐亭毗邻的丰山东麓脚下,又隆起一片恢宏的历史建筑群——“南京太仆寺”,复建的太仆寺衙署成为唯一的中国古代马政展示馆。明洪武六年(1373),明太祖朱元璋诏定在滁州设立管理全国马政的中央机构太仆寺,永乐十九年后改称南京太仆寺,寺署在滁州存续270年,直到明朝终结,其间所推行和演变的马政制度,与明代国计民生、社情人文密切相关。一拨又一拨文人名宦在这里留下交游的踪迹。南京太仆寺少卿雷礼等人编撰、嘉靖三十一年(1552)刊行的《南京太仆寺志》,是记载马政史的珍贵文献,经专家学者整理,2021年11月由黄山书社出版,打开这套史乘,我们可以从中探寻琅琊山下到大江南北的马政史迹。

### 书苑颀风



## 1 南京太仆寺的设置

古代人类社会活动与马匹密不可分,在漫漫两千年之久的冷兵器时代,马匹是行军作战和交通运输必需的动力装备,马匹的繁衍关系国家兴亡,“马政即国政”。因此,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马政。“太仆”就是为周天子执掌牧马的官名,秦汉时为主管皇帝车马的职官,位列九卿,以后逐渐转为掌管舆马和牧畜事务的朝廷机构“太仆寺”,隋唐至明清时代沿置,且有一套马匹牧养和管理的制度。戎马半生的明太祖朱元璋尤其深谙马政对于大明王朝的重要,他认为:“自古有天下国家者,莫不以马政为重。”定鼎金陵之初,他便设立群马监管理养马,接着,在滁州正式设立太仆寺。洪武八年,朱元璋又一次巡行滁州,视察太仆寺,并登上丰山岭瞭望。洪武十一年在丰山下新建太仆寺官署。至洪武二十三年,太仆寺共设十四个牧监,下辖九十八牧群。

明太祖将太仆寺设在滁州,既有历史情缘,更有地理因素。一方面,因为滁州是朱元璋打江山的第一块“革命根据地”,他对滁州乡亲的淳朴民风深有体会,有明一代,滁州誉为“开天首都”。另一方面,滁州对京畿的拱卫作用,两京驿道清流关关刻着四个大字“金陵锁钥”。环滁皆山,层峦起伏,山环水绕,草木丰美,适宜牧畜。江北各州县马匹来此地检查、征调方便,无需渡江前往南京。

明成祖朱棣改朝以后,另设北京太仆寺,永乐十九年(1421)设于滁州的太仆寺改称南京太仆寺,与北京太仆寺划疆分治。南京太仆寺管辖范围包括南京应天府、江南直隶镇江府、宁国府、太平府、广德府、江北直隶凤阳府、扬州府、淮安府、庐州府以及徐州、滁州、和州等九府三州的马政和草场,供应朝廷和军队的需要。

南京太仆寺为从三品衙门,长官设卿(从三品)、少卿二员(正四品)、寺丞六员(正六品)、主簿一员(从七品),下有马科令史、典史、杂科令史等属吏。有明一代,南京太仆寺衙门共有太仆寺卿145名,少卿153名在滁州任职。南京太仆寺的官吏,有许多名宦高士,他们学养深厚,问学之遐热爱于山水文化与理学精神的追寻,客观上有助于经典人文的传承和新思想的推波助澜。正德八年,王阳明来任南京太仆寺少卿,在滁州督马政同时讲学,各地来滁从学者二百多人,开启了阳明心学游学之端。

南京太仆寺署西依丰山,北望丰乐亭,咫尺龙潭,相临幽谷。沿丰山下西行,到醉翁亭也仅三里之途。寺署周边山水清幽,树木葱茏,前后两条溪水环流,山下野坡广阔,便于校阅

马匹。太仆寺附近有龙泉寺、马神庙。太仆寺西南侧的龙潭,林木幽深,潭水清澈,山崖半抱,东北侧高阜坐落着巍峨的明太祖御碑亭。凡太仆寺职官上任伊始,均要来此拜谒。

寺署建筑布局坐南朝北,东南立有牌坊,门前有照壁。进入大门,沿中轴线排列仪门、正厅、后堂、栖云楼。正堂为寺卿衙舍,东西分列少卿、寺丞、主簿衙舍。正堂西北有“三柏堂”“对峰亭”和“活水亭”。东南有一座“德星堂”。东西两庑分别为吏舍、库房等。寺东筑有环山楼,前有迎宾馆。整座寺署环境严整清幽。明清更替,历经兵火烟雨,渐至颓废。

## 2 明代养马政策的演变

养马于民是明代马政的基本国策。朝廷牧马管理制度,经洪武年间初定,永乐年间修订,逐渐完备,形成一套民牧、军牧和寄牧相结合的制度,后来又不断调整。马政管理主体为民牧系统。军牧主要指由屯军卫所和京营边镇军士牧养在役战马。两京太仆寺主要管理民牧。

民牧是指由各地方府州县贵令百姓孳牧官马,按期征解马匹。民牧制度的核心是繁育马匹,再将马匹征用于军事国防和朝政所需。

养马要具备一定的自然资源,山川旷地,水草丰美,才能成群牧养。各府州县都划定了若干草场。据当时人估计,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,拿来种田,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。养马成当时一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体现。马群规格,北方一群马10匹,2公8母。南方一群马5匹,1公4母。一群马选立一人为群头,五群立群长一人管理。

民间养马是国家规定的义务。官府根据民户的丁口田产等情况,将马匹交由饲养,按期缴纳马驹,同时减免养马民户的田租。先后实行“按户计马”“按丁计马”法以及论田养马等等。养马民户,15岁成丁至60岁,一辈子要养马。江南江北有十丁养一马和五丁养一马之别。朝廷严格规定每年征缴马驹的时间和数量,永乐十二年,养马户一岁征一驹。洪熙元年(1424)改为二岁征一驹。民间养马有三类:种马、使马、寄养马。种马者,儿马驷马搭配孳牧繁殖。使马者,以优良健壮的骡驹解送国家。寄养马,以解表马发寄定牧点牧养以备用。马政规定“种马死,孳生不及数,辄赠补”的赔偿条例。养马户不仅要保证马驹的数额,而且保证马的健壮,否则若“有倒失老病不堪表者”,必须如数赔偿。

百姓养马的沉重负担,也造成了官僚体制的压力。太仆寺管理的马政事务,包括督察、点视、印烙、编马户、交兑、发表等。每项事务必须付出艰难努力才能完成。朝廷官员关于马政的奏章连篇累牍,可见马政之难之繁。官僚体制在推行马政的过程中,压迫与恤助并行,《南京太仆寺志》卷一记载了洪武以后十位皇帝为马政颁发的诸多诏谕敕令,其中有对太仆寺职责的规定,有体恤养马民户困厄而蠲免的政策。为提高马政效率,明政府加强对管马官吏的选用、监督,重罚渎职官员,强化查验制度等等。

明朝中期以后,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局势的多重变化之下,民间养马的弊政日趋显现,马户们因养马法苛而逐渐疲惫,官僚体制的弊端又加剧了马政颓势。随着宗室藩王以及各地豪强势力兼并土地越来越严重,养马草场悉数被侵占。面对马政逐渐走向衰变的困境,朝廷不断改变役民征马办法,诸如定种马之额、征折色、定寄养之数、变卖种马、马草折银等等变革措施。明朝前期,南京太仆寺管辖的江淮和江南大部分地区,种儿骡马数量共三万七千五百匹。弘治以后,马匹数额大减,南京太仆寺所管辖的马户、马匹、草场等马政资源都逐渐白量化。万历九年(1580)奏准将存留种马尽行变卖,上等马价不过八两,下等五两,马价银由太仆寺专管,专用于京营、边镇购买战马。民间孳牧体系至此崩溃,南京太仆寺的马政职能也逐步弱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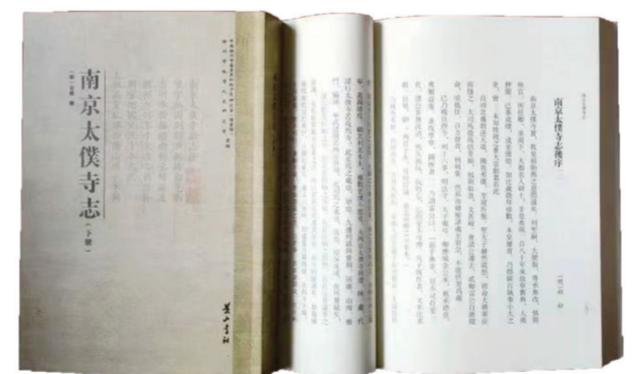
## 3 《南京太仆寺志》的编撰背景及其内容

嘉靖二十九年(1550),发生庚戌之变,蒙古俺答兵掠北京城下,朝廷急调兵马抵御,太仆寺所供战马不济。同年,雷礼新任南京太仆寺少卿。雷礼(1505—1581),字必进,号古和,祖籍江西丰城,出生于福建建安,嘉靖十一年(1532)进士,崇仰阳明心学,博极群典,娴于经世之略,曾编撰多部政史人物类书籍。雷礼上任后,痛感马政弊显,已经影响明军战斗力。他查阅了有史以来特别是洪武朝以来的马政牧典,思索一百八十年推行马政的种种利弊,力图挽制于不敷,有心编辑一部关于牧马的政书。

雷礼的想法得到了为卿的余胤绪和另一位同僚少卿洲人章焕的赞成。他们共同感受到马政的危机,认为只有重振马政制度,理顺管马之务,申明条令,纾民以困,才能确保战时马匹的正常供给,强兵卫边、充实国力。因此太仆寺有重申明典章、明书史乘、追往鉴来的必要。于是,南京太仆寺发布《纂修寺志公移》,阐述了修志缘由和重要性,以便各府县据之行事,以存往昔,兴利除弊,以重振马业,昭示将来。按照修志公移,时各府州县皆按太仆寺之要求,依内容之条款“逐一备查,详造书册,送寺以凭查修施行。”

编修《南京太仆寺志》的工作,得到当时落任在乡的滁州籍阳明学人戚贤和名宦胡松的襄助。书成,戚贤和少卿章焕作序,胡松撰写了后序。

戚贤在《寺志》序中,对雷礼撰修体例和内容作了概括:“古和(雷礼)秉笔睿思,首述圣谕敕书,重马政也;次述事例,表章程也;次述官司,正体统也;次述辖属,示铃制也;次述规制,明官常也。其诸凡例、列传、遗文,采摭引证,有纲有目,有典有则,有经有权,虽与《周官》并行可也。”全志共十六卷,卷一谟训,卷二孳牧,卷三征使,卷四关换,卷五储买,卷六宽恤,卷七官寺,卷八属籍,卷九规制,卷十丁田,卷十一种马,卷十二草场,卷十三册籍,卷十四俸徭,卷十五列传,卷十六遗文。全志以皇帝的圣谕开始,以大臣的奏议终结,首尾完整,结构合理。各卷多以原始文献载入,保存了马政实施以来的第一手资料,信息量大,准确性高,透过其中的内容,可以溯历代马政之要,尤其可以观明王朝中央政府对于马政的种种决策、马政实施之概况,以及南直隶区域内的地理与民政。且从中可窥见明前中期的政治、经济社会背景。



值得一提的是,《寺志》卷十五列传,记载了洪武至嘉靖初十余名太仆寺官员事迹,有朱守仁、程信、张抚、文林、吕懋、李应祯、杨廉、王守仁、刘瑞、杨果。这些名宦资料,对于研究明前中期政治、思想、文化和人物关系,具有一定价值。如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的父亲文林、叔父文森,曾先后在滁任南京太仆寺寺丞和少卿,文氏兄弟悉心研究开国以来马政演变的利弊,探究古今牧养管理经验,上疏改制“条列古今养之法,与今之利弊宜革者,凡言皆切中当时之弊。”

主编者雷礼采用了史记“太史公曰”的文法,每卷前有引言小序,卷末有按语,书中援引古制,议论纵横,阐述观点,凸显出编著者企图以重整马政来经国济世的抱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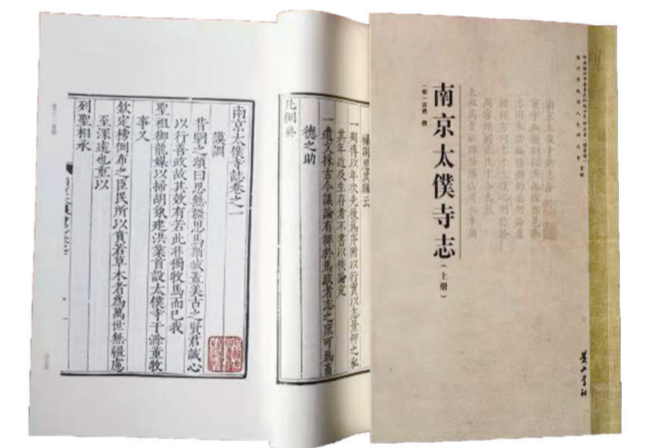
## 4 《南京太仆寺志》的整理和研究

嘉靖三十一年(1552),《南京太仆寺志》编成并正式刊行。五十年后,万历二十四年,另一位(曾任过南京太仆寺)的杨时乔又编纂了一部《皇朝马政记》,其中不少资料来自于嘉靖时期的《南京太仆寺志》。

《南京太仆寺志》的编著者竭力想从总结历朝马政经验中,从体制机制层面分析典章政策施行利弊,重振明初马业,以振兴国力,是书成为一部重要的政史;《寺志》详尽记述了太仆寺官督民牧的事务程序,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马政专著;书中有关太仆寺职官、人物、规制、册籍、草场、俸徭等记述翔实,许多细节和数字均可补《明史》、地方志之缺略。例如《寺志》

以大量篇幅记载了王守仁的事迹,并记述了阳明精舍、来远亭、马政衙、官仓等情况,是对王阳明研究史料的重要补充。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,它不仅受到当朝重视,而且对明后期以至清代马政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,对于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研究,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。

长期以来,明代马政及南京太仆寺的研究没有被重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零星刊发过一些关于明清马政的研究文章。近二十年来,滁州的文史工作者和高校相关学者在研究明史文化的进程中,开始关注《南京太仆寺志》,陆续开展了相应的介绍、解读和研究,有关明代马政和太仆寺的课题逐渐增多。2015年,滁州市政府依据《南京太仆寺志》等文献记载,对照实际地理位置,对太仆寺遗址进行考证,参照明代太仆寺署图,在旧址复建南京太仆寺。滁州市政协文史委组织专家,整理太仆寺卿编刻的艺文集《南滁会景编》,于2016年出版。2017年召开的“王阳明在滁州”研讨会,南京太仆寺进一步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。张祥林等政协委员提出,依据《南京太仆寺志》,在复建的寺署建立“中国马政博物馆”。2019年,琅琊山下的南京太仆寺署布展开馆。整理《南京太仆寺志》,成为相关文史文献学者的既定课题。



2010年,南京图书馆王英姿曾著文《南京图书馆藏〈南京太仆寺志〉考述》(江西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3期),介绍了《南京太仆寺志》的成书、内容以及版本流传等情况。

嘉靖三十一年刊行的《南京太仆寺志》十六卷本,后世没有再刻,故无其它版本。此书首页有清代藏书家丁丙跋语手迹,铃印“八千卷楼藏书之记”,书末有“光緒庚寅嘉惠堂所得”等印,可见是书由“八千卷楼”主氏于光绪十六年(1890)所得,现藏于南京图书馆,为迄今发现唯一的十六卷完本(仅缺封面和目录)。《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》(第十九册,线装书局,2010年版)所藏的《南京太仆寺志》为十一卷残本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(史部第二五七册)著录的《南京太仆寺志》浙江巡抚采进本,即十一卷残本,“兹本只十一卷,《草场》以下全佚,非完书矣。”隆庆年间,顾存仁(1502—1575)曾撰《太仆寺志》十四卷,但“脱略太多”,许多资料阙而未叙。因此《南京太仆寺志》十六卷尤显完善而珍贵。1986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《南京太仆寺志》十六卷影印本一函四册。1994年《南京太仆寺志》十六卷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。2016年南京凤凰出版集团出版“金陵全书”,再次影印南图藏本《南京太仆寺志》。我们此次整理,即依据南图藏本,进行点校、释要、重新编目,与影印合为一套两册,并对书中的讹漏之处予以订正。例如,此书后序亡作者名,可能因末页遭毁所致,我们据文与《胡庄肃公文集》对校,补证后序作者为落职回乡复出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的滁人胡松。

《南京太仆寺志》整理出版,得到滁州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,滁州市史志研究室(档案馆)延请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团队,张祥林领衔,张铨、张道锋点校,王浩远、罗志释要、编目,庚子年底完成整理稿本,于2021年《南京太仆寺志》刊行470周年之际出版面世。

### 春潮

